“凝固的叹息”与“流淌的自强不息”

——浅析康梁二人缘何相聚又分离

自光绪十六年康梁二人相识于上海起，历经万木草堂的师生之谊，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的惺惺相惜，流亡海外的相互挂念，辛亥革命后的争锋相对，康有为离世后梁启超的悲痛惋惜，二者的人生道路聚散离合，命运交织纵横，各自在“老大中国”向“少年中国”行进的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康有为终其一生没能走出他四十岁时的执念，囿于《三世说》、《公羊学》等“三十所成之学识”，抱着“虚君共和”的执念病逝青岛。戊戌变法俨然成为其人生巅峰，其后人生逐渐黯淡无光，直至去世，令后人悲叹、哀婉而争论不休；梁启超则自公车上书而始登历史舞台，戊戌变法仅仅为其拉开序幕。饮冰室主人，思想之进步，人格之高尚，治学之巍然，百年后的今天仍令人感佩。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二人的人生轨迹产生如此重大差别？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析。

笔者认为，二者的差别源于梁启超的“流质”性与康有为的“凝质”性之间的根本性差异。[[1]](#footnote-0)康有为晚年时寄信梁启超，“汝真一极流之质, 吾一凝质, 望汝后勿再流而已”[[2]](#footnote-1)，便已然指出了这一差异。所谓“流质”，指“具有一定可流动性的液态物质”，“常与多变、多欲、机智、随和、无成见等性格特征相联系”[[3]](#footnote-2)，符合古人对“上善若水”的推崇，也可作为梁启超一生的写照。而“凝质”，此处应指“凝聚的固态物质”，“具体表现为执着、强毅、主观、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特点。”[[4]](#footnote-3)康有为言他一生的学识自三十岁起便不应再变，也不会再变。不应再变，折射着康有为对自身学识的自信；而不会再变，无法再变，却无疑反映出其人格的局限性。若将康有为的人生视为“凝质”，那么他的人生便是“凝固的叹息”，自戊戌政变后，其人生凝固为一声悲叹，悲叹改革无方，皇权凋敝，救国之心有余而力不足，仅此而已。而若将梁启超的人生视为“流质”，那么他的人生便是“流淌的自强不息”。映照着他在清华学堂以《君子》为题的振聋发聩之谈，也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他“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5]](#footnote-4)的人生。后文将逐一加以例证。

1. 从戊戌变法到武昌起义：初遇、分离与重逢

康梁二人的人生轨迹，可概括为“求学草堂时的初遇”，“逃亡日本后的分离”，“自美归来后的重逢”与最终“辛亥革命后的诀别”，即两次相聚，两次分离。两聚两别，皆与梁启超的“流质”性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梁启超求学万木草堂时，性格本差异巨大的二人聚为知己的本源，在于19世纪末，康有为超然世人的“凝质”思想——君民共主，变器变道——极大地吸引并启迪了少年梁启超。

自上书不达，康有为离京返粤，痛感民智未开，孤掌难鸣的唯一改变之道便是亲执教鞭、推动维新。机缘巧合下，因陈通甫引见，梁启超结识了恩师康有为。经过几番深谈，少年梁启超心中旧学的壁垒一朝间彻底破碎。“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6]](#footnote-5)康学“凝质思想”所含有的“君主立宪、维新改制”理念，于当时的梁启超而言，诚然超乎贴括、训诂之外，在其“流质思想”的沃土间萌芽。

四载从师学习后，梁启超师承来自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改良主义扎根之深，即便在戊戌变法后至辛亥革命前的十余年间，政治思想上走“之”字形道路的梁启超大部分时间依然以改良主义为主。譬如逃亡日本后，梁启超最初依然唯师命是从，认为民智未开，应缓行“民政”。乃至1899年3月在《清议报》上发表《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一文，认定“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7]](#footnote-6)

可见康梁二人的初遇遇即塑造了梁启超“流质思想”的底色——改良主义，然而改良主义并未能禁锢梁启超思想的“流质性”。

自东渡日本后，梁启超亲身接触到资本主义世界，博览西方资产阶级的大量启蒙作品，政见已暗中改变，认为通过他人编著的各国国志了解资本主义世界“是无疑于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也。”[[8]](#footnote-7)在1898年10月至1899年3月，梁启超已然私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相来往。1899年3月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梁启超在思想上得以挣脱康有为的束缚，成为在日维新派的领袖，公开和孙中山等来往密切，商议两党合并之事。1899年至1903年初，梁启超大力提倡民主自由，鼓吹“破坏主义”，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在1900年写予康有为的万言长信中，梁启超梁启超详尽的阐述了他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坚信民智、民权、民政涤洗社会。欲“以万钧之力，激励奋迅，冲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怒。”[[9]](#footnote-8)从中可见，此时他主张的“破坏”根本目的在于社会变革（revolution）而非以往变法不得而退而求其次的温和的社会改良（reform）。他已不再如以往一般拳拳服膺康学，甚至对于恩师康有为“保孔保教”的思想加以批驳。他直言：“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10]](#footnote-9)二人政治思想的巨大分歧终于公之于众。

纵览康梁二人的逃亡日本后的分离，无疑源自梁启超的“流质思想”使其欣然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共和思想，以往康有为“改良维新”的烙印未能阻止梁启超思想的流动。破除“四书五经。刻板教条”的旧论，使梁启超结缘康有为；也因为破除“尊孔保教，变法维新”的旧论，梁启超第一次与恩师康有为分离。综上所述，“求学草堂时的初遇”，“逃亡日本后的分离”皆是梁启超“流质性”使然。

从这一观点出发，1903年，梁启超自美国考察归来后竟然与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重逢，使人颇感匪夷所思。难道梁启超的思想竟然发生“凝质化”，以至于政治思想倒退？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本质上，笔者认为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作用。

主要因素为在美国考察期间，梁启超先前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过高期望与美国政治现状间的显著差异使梁启超对渴求的“民主共和”理想产生深度怀疑。梁启超心中近乎理想的美国政治制度，却存在着“政党分赃”、“庸才当政”、“市政腐败”、“大党专权”等重大弊端。基于晚清中国的民族性的落后现状，梁启超认识到国民性改革的艰巨，以此深刻反思中国“民主共和”的可行性。以美国的民主意识与自由主义传统尚且如此，若贸然在缺乏民主基础的中国施行民主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反思促使梁启超再次发生思想流动，这一思想流动使他的思想从“民主共和”流向“开明专制”，即所谓的“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无奈这一时期的思想流动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思想倒退，从而使人怀疑为思想的“凝质化”。但是纵观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思想变迁，我们仍然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思想变迁仍然源于“流质性”带来的思想流动而非“凝质化”造成的思想倒退。辛亥革命后康梁二人的思想诀别无疑亦是一大明证。

另一方面，师生关系的致变作用也促使了二人政治思想上的重逢。流亡日本后，由于思想激进化，鼓吹破坏主义，宣扬革命排满，梁启超与昔日维新旧友日渐隔阂。然而结识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派人士，彼此之间来往密切，同时时务学堂一批弟子东渡日本再度从师，并没有使梁启超在个人境遇上感到孤独无助。无奈1900年从檀香山归来后，由于康有为认为自立军起义失败是梁启超筹款不力所致，并且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政治思想发生框架性改变，早已难以与康有为达成共识，师生二人矛盾空前。并且，由于1899年12月，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前往檀香山统筹保皇会事物，再度为武装勤王筹措经费。檀香山恰为兴中会发源地，保皇会的建立使兴中会的势力受损，二者不得不竞争有限的华侨捐款。梁启超如此行为，不一定是出于欺骗[[11]](#footnote-10)，但对于兴中会的确可称为“欺人太甚。”革命党纷纷认为“（梁启超）保皇是真，革命是伪，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两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能混淆。”[[12]](#footnote-11)于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关系迅速恶化，孙梁关系也濒临破裂。

尽管梁启超与两党皆出现分歧，但师生情谊毕竟仍然维系在康梁二人之间，昔日所处的维新派俨然还有容留梁启超的可能。基于对美国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与师生关系的致变作用，梁启超再次发生思想流动，并提出“开明专制”。

1. 辛亥革命后的诀别

回归维新堡垒后，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理念，继承并发展了康门的改良派思想。反思变法历程与其后几年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切实亲身体会，梁启超指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13]](#footnote-12)变法对于清廷是一味太过猛烈的药，放弃变法，不意味着清廷放弃自救，出于本心与师恩，以“开明专制”的理论，1905年3月至7月间，他与革命党人展开激烈的论战。与此同时，1907年9月，清廷设立资政院，这种仿制“议院”的机构仿佛透露着清廷对于改革的决心。无奈清廷统治阶级过于迂腐，资政院大多议员仍为满清贵族，并且历尽波折、费劲“千辛万苦”才派出的留洋考察使者最终竟得出结论：君主立宪不适应大清国情。世人昔日以为“立宪拯救中国”，清廷毫无诚意的改革令人大失所望。时间推移，越来越多青年人奔向革命党，革命党的组成也越发多样化，广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梁启超无奈间发觉，除非革命，寄希望于清廷自新来救这“老大中国”太过困难。其政治思想再次流动，在“开明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立宪政治”，并形成了立宪派，再次与康有为发生分歧。不过这时的分歧更多应看做“继往开来”而非“诀别”。

二人的诀别发生于辛亥革命后。武昌起义后，仍然对对清廷抱有怀想的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也是一片欢呼雀跃，群起组织“立宪共和”党派，得到了革命派的接纳。此后，梁启超主张“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仍固守所谓“虚君共和”，二者矛盾越发尖锐。民国成立后，康有为“尊孔保教”，积极复辟，先为袁世凯利用，之后又参与谋划“张勋复辟”的闹剧。梁启超则坚持维护“民主立宪”，哪怕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关键时刻，亦决然冒着生命危险与蔡锷共举起义大旗。针对喧嚣甚上的复辟逆流，梁启超挥笔书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康有为在《上海周报》发表文章《为国家筹安定策者》，梁启超则发表《辟复辟论》，终于将矛头直指康有为，痛陈其师“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14]](#footnote-13)他明确表态，“师弟自师弟, 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 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15]](#footnote-14)而康有为则痛斥梁启超为“梁贼启超”，二者于此诀别，此后长期交恶。

纵观康梁二人的两聚两别，可见，“凝质”与“流质”的差别诚然为师徒二人相聚与分离的主要原因。站在康有为的视角，“凝质”本性必然导致其政治理念与君主密切相关。无论是光绪还是溥仪，君主才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无法从坚持了数十年的理念中脱身，与其接受革命与共和，他宁愿选择复辟，单纯地渴望把20世纪的政治问题化归到19世纪末的社会环境下解决，然而时代的复杂性与异化程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梁启超的“流质”本性与超然的洞察力也决定了在任何时刻，他的思想始终维系着拯救当世中国的最佳路径。变法之前，革命成本太高，与雄心勃勃的光绪帝一同改革社会制度无疑是不二良方。而变法之后，世人皆意识到了清廷顽固统治阶级的思想之腐朽不堪，变法俨然无以救中国，而“凝质”康有为仍固执地坚持变法、维新与改良，甚至不惜走上复辟的道路。“流质”梁启超则历经数次思想流动，几经变迁，最终得出独到的适宜当下中国的不二法门。

1. 后世之思：“流质”为何会成为“流质”

总而言之，究其一生，康有为都没能走出着他脱离现实的执念，渴望温和地改变政体，“虚君共和”，为万世开太平，戊戌变法后其人生几乎仅剩“凝固的叹息”。对梁启超而言，戊戌变法却只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或者说，康有为的人生巅峰仅仅是他的人生起点而已。固执乃至几分迂腐的“凝质”最终与善变的“流质”分道扬镳。康梁的联系，陌路时乃至仅剩残存的些许师徒情谊。

每每有人批评梁启超善于政治投机，善于寻求机会。但笔者认为，站在梁启超的立场上，他的一切决定皆是遵从内心的。变法刚破灭时，反对革命党是真诚的，辛亥革命前夕认可并坚守民主共和也是真诚的；少年时积极汲取西方文化渴求民主自由是真诚的，游历北美后认为西方文明已死也是真诚的。笔者在此提出，梁启超思想的“流质”性，究其本源，乃是梁启超对于东西文化皆有其深刻的洞悉。绝非单纯的学贯中西，而是对中西文化的深入剖析。相较于同时代大多人，包括他的恩师康有为，他更为接近东西文化各自的内核。故而，当各式思想与政治派系相互争斗时，梁启超总能及时发现何者更为适宜当下的中国。出于此，他要么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要么成为各派争相批判的对象。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下，他总能及时洞察每种政治主张背后的合乎东方或者西方文化的道理。在不同的境地下，他深刻地理解到各个流派自身的局限性与合理性，并付诸行动。“流质”性乃梁启超遗世独立、超然世人的本源。可惜，另一方面，“流质”性或许也是梁启超的莫大遗憾。终其一生，他没能将自身所意识到的丰富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内化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总有人感慨，梁启超若不是因为医疗事故病逝，或许可以将自身的思想“凝质”化为完整的思维体系，也许现在世人便可研习“梁学”如同研习王阳明“心学”一般。可笔者仍然认为，假以时日，梁启超依然绝不会将自身的理念“凝质”化。如果将康有为喻为“凝质”或者说“死水”，那么梁启超便是“流质”或者说“源头活水”。“流质”，正是梁启超遗憾之处，也是他人格中最大的光芒。

四.结论

综前文所述，康梁二人的聚散离合乃“流质”与“凝质”之间的差异性使然。“求学草堂时的初遇”，“自美归来后的重逢”，“流质”梁启超的思想两次流向康有为“凝固”的“改良与维新的洼地”。“逃亡日本后的分离”与最终“辛亥革命后的诀别”，“凝质”康有为抱残守缺，坚守着不适宜“老大中国”的君主立宪、虚君共和、改良维新而后郁郁终生；梁启超则积极地接受时代的变革并不断探索那独属于冉冉新生的“少年中国”的变革之路。

“流质”或许是梁启超一生的遗憾，但笔者认为，此确为其人生闪耀之光芒！

参考文献

1. 邓杰：《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原因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第2期，第134-139页。
2. 喻中：《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第199-208页。
3. 杜先菊：《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104-113页。
4. 赖骏楠：《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以“1903年转型”为核心考察对象》，《 清华法学》， 2016年第3期，第147-166页。
5. 付金柱：《“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梁启超政制观转变的美国因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2期，第105-114页。
6. 桑兵：《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第53-69页。
7. 班玮：《梁启超的日本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5-41页。
8. 张卫娣：《梁启超国家主义转向的日本因素——以加藤弘之为中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88-94页。

1. 王明德：《凝质与流质之间——康有为、梁启超的个性差异与其不同的政治境遇》，《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77页. [↑](#footnote-ref-0)
2. 康广仁：《与何易一书》，张元济编著；《戊戌六君子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年，第65页。 [↑](#footnote-ref-1)
3.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8页。 [↑](#footnote-ref-2)
4.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9页。 [↑](#footnote-ref-3)
5.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编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 [↑](#footnote-ref-4)
6.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6页。 [↑](#footnote-ref-5)
7. 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footnote-ref-6)
8.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编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页。 [↑](#footnote-ref-7)
9.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footnote-ref-8)
10.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易鑫鼎编著；《梁启超选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footnote-ref-9)
11. 郭世佑：《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26页。 [↑](#footnote-ref-10)
12. 孙中山：《复黄宗仰》，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编著；《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footnote-ref-11)
13.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 [↑](#footnote-ref-12)
14. 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2012年，第46页。 [↑](#footnote-ref-13)
15. 经堂:《康有为与梁启超》，《古今月刊》，创刊号，1942年第1期，19页。 [↑](#footnote-ref-14)